

· 军史编研 ·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研究述评

聂文婷

摘要: 最早对中国原子弹研制的研究来自于国外学者。而国外学者对此研究主要在两方面: 中国核决策的动因; 美国对中国原子弹研制的态度与策略选择。国内学者广泛关注的热点主要在: 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策; 苏联对华核援助及其撤援; 原子弹成功研制的经验与意义。研究的不足: 这段历史的研究不够完整; 重要历史关节点的研究过于僵化。其原因主要在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两方面。

关键词: 中国 第一颗原子弹 研制 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 E2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451(2013)02-0169-07

作者: 聂文婷,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师, 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291)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爆成功。这一巨响,粉碎了超级大国的核威胁,保卫了世界和平,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巩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加速了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正如邓小平所言“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279}然而,20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档案高度保密、资料匮乏等客观因素,学术界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研究因研究条件的不充分而未完全展开。80年代初,随着一批相关文献的披露和档案的解密,包括一些当事人回忆录的发表,有关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研究才逐渐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一、国外研究现状

依据现有资料,最早对中国原子弹研制的研究来自于国外学者。从研究视角看,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 关于中国核决策的动因。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发展原子能决策动因的研究抱有特别的兴趣: 一个经济、技术基础十分薄弱的国家为什么要掌握原子能这项高技术? 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1962年,美国学者爱丽丝·兰格里·谢出版了《共产党中国在核时代的战略》^[2]一书。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本研究中国核战略的论著。作者认为,自1945年美国核试验成功并在日本投爆原子弹以来,中国领导人关于核武器的理念和实践经历了一个最初只在偶然场合提及核武器,到1954年开始出现“好战倾向”并最终决定依靠苏联力量发展核武器的变化过程,导致这一变化过程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核时代中国所面临的安全态势。1964年,爱丽丝·兰格里·谢在其另外一篇关于中国军事战略的文章《共产党中国的军事秘密》^[3]中再次提及中国作出核决策的原因,认为在中国的军事战略中,实用主义占有绝对的支配地位,因此,依据中国在核时代面临的国家安全态势来判断,中国的核战略完全是防御性质的。20世纪90年代初,原子能出版社出版了《世界原子弹氢弹秘史》丛书。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斯坦福国际战略研究所

所长约翰·W·刘易斯和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研究中心薛理泰共同撰写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4]一书,通过引证大量资料,考察了中国领导人从决定发展核武器到成功实现首次核试验的历史过程;对中国的核计划与其他国家,主要是美国的核计划作了比较研究;追溯了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美国对华核政策及相关军事行动;阐释了中国在当时的形势下,发展原子弹、氢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依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原因和动力来源的范畴,本书把中国核决策的动因归为两点。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对原子弹的认识以及一支为原子能事业积极献身的研究队伍的组建是中国作出核决策的内部因素,具体表现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科技人员对核科学研究极大的兴趣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不过,这一观点是建立在怀疑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的基础上的。作者认为,中国在战争实践中逐渐体会到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对于现代战争而言不相干且不实用,所以才对军事高技术和军队现代化产生了兴趣。另一方面,朝鲜战争、日内瓦会议和台湾海峡事件是促使中国决心建立核战略力量的外部因素。战争把中国引向了先进的武器和技术时代,包括核威胁时代。为了在这个现代的世界里生存下来,中国应该拥有也必须拥有现代化的武器。然而,正如英国学者 L·巴达希和 M·亚历山大^[5]所言,约翰·W·刘易斯和薛理泰所能利用资料的准确性和全面性还有待商榷,再加上有限的一手资料以及对中国的战略文化缺乏深层次的了解,上述研究多有偏颇之处。

(二) 关于美国对中国原子弹研制的态度与策略选择。多数国外学者认为,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主要从两方面对中国国家安全发起挑战。一是美国政府准备对中国核设施进行防御性军事打击;二是美国发起禁止核试验条约以遏制中国正在进行的原子弹研制工作。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张少书的《肯尼迪、中国和原子弹》^[6]一文首次使用了美国官方档案,揭露了美国欲借助军事手段打击中国核设施的企图。从美国、苏联、中国错综复杂的战略关系入手,围绕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张少书重点考察了肯尼迪政府如何评估中国核武器的影响力、美国如何利用中苏分歧以鼓动苏联共同遏制中国核研究等行动,指出肯尼迪政府早期的打算是希望能够联合苏联对中国核基地实施军事打击。为此,美国作了至少一年半的努力,未见成效后才将注意力转向了禁止核试验条约。1997 年,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高级分析员威廉·伯尔、杰弗里·理查逊发表了题为《是否“杀死摇篮里的婴儿”:美国与中国核计划(1960-1964)》^[7]的论文。作者对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就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而展开的政策讨论和对策选择,尤其是对中国核设施实行军事打击从酝酿实施到被否决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揭露了美国遏制中国核计划的事实。此外,这篇论文披露了大量有价值的史实,对于我们今后的研究有诸多裨益。如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主席威廉姆·福斯特曾与一位历史学家在谈话中透露,肯尼迪的确考虑过挑战政治性危险,甚至不惜牺牲美欧多边核力量提议以获得苏联的支持,共同胁迫中国签订 1963 年的禁止核试验条约;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起美国就使用 U-2 高空侦察机和间谍卫星对中国的核试验进行严密的监控和跟踪研判;美国政府高层关于中国核试验讨论的细节等等。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近些年,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有关的学术成果日渐增多,当中不乏一些颇有见地的精品力作。由李觉等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核工业》^[8]就是其中之一。该著作以当代中国核工业的创建和发展为主题,用较大篇幅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历程进行了考察。本书先以历史为序,梳理了这段历史中的重要关节点和重大问题,每一阶段的论述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再依据原子弹研制工程的构成,从横向展开,对各行业、各部门的具体分工进行了记述和归纳,以求从不同侧面揭示这段历史的全貌。本书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方面,没有将纵向梳理与横向展开结合起来,这就使得纵向梳理难免有些粗疏,而横向考察

又缺乏时间的连贯性;另一方面,本书就原子弹谈原子弹的成份较多,没有将整个原子弹研制历程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很好地结合起来。然而,从总体上讲,该书的编纂与出版,不仅是“核工业战线的一件大事”,更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史料基础,填补了学界对中国核工业发展历程中各项重要工程、各个时期和各重大事件进行专题性考察的空白。

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相关的论著,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由权威部门出版的国家领导人的年谱、传记、回忆录、或本人或由他人撰写的回忆性文章。^①这类论著忠实记录了参与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的领导者、科研工作者对这段历史的贡献与思考,为我们考察某些细节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一类是国史、党史、军事史著作。^②尽管这类论著多是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概略提及,但可以为我们从大背景下理解这段历史提供借鉴。还有一类是相关问题专著、学术论文、硕士博士论文。

^③这类论著多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为载体,以各自的研究方向为切入点,对这段历史中的某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专业考察,很大程度上可以引导我们从不同视角去理解这段历史。从总体上讲,以上研究成果主要呈现两个特点:或是以中国原子弹研制这一整体事件作为背景史料来探讨其他相关问题或重大事件,或是提取原子弹研制历程中某一重要环节或领域从非历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因此,严格意义上讲,这些论著都不是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历程的专门性研究成果。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正是这些相关性研究成果使得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日益充盈,并逐渐形成了一些引起广泛关注的研究热点。

(一)关于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策。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了要创建和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是我国原子能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会议。从此,中国进入了“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但中国为什么偏偏在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科学技术、经济和工业基础都相对较为落后的情况下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策?这一疑问引起了学界的长久关注,并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第一,自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爆原子弹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就开始关注原子弹,并开始了核研究高级专业人才的延揽、相关研究机构的组建以及铀矿资源的勘探等工作。^[9]因此,对于发展原子能事业,中国共产党未雨绸缪,做好了准备,而非一时的冲动之举。第二,中国走上核武器发展之路,一开始就是在国家安全面临巨大压力的背景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战略选择。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朝鲜战争及台湾海峡危机中对中国的核威胁、核讹诈促使中国领导人定下决心要发展本国的原子武器以粉碎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反对核战争。所以,中国研制原子弹,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国家利益,特别是

^①金冲及.周恩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袁伟.朱德军事活动纪事[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聂荣臻传记编写组.聂荣臻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周均伦.聂荣臻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东方鹤.上将张爱萍:上、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张胜.从战争中走来[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宋任穷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刘杰.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者和组织者[C]//不尽的思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袁成隆.忆中国原子弹的初制[J].炎黄春秋,2002(1);李觉.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要闻[J].百年潮,2004(10)。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第2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刘国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长编:第2、7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

^③吴玉崑.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M].北京:原子能出版社,2010;谢光.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刘子奎.美国政府对发展核武器的反应与对策(1961-1964)[J].中共党史研究,2007(3);高铁军.毛泽东国防现代化思想初探[J].军事历史研究,1987(3)。

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① 第三,苏联愿意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方面给予中国技术方面的援助,则为中国作出核决策提供了有利的时机。^② 对于中国是如何争取到苏联援助,亦或说苏联为什么决定给予中国核援助已经成为学界长久关注的热点之一,下文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专门的概括。第四,国外友好人士的建议和帮助,也是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发展核武器的因素之一。^[10]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有一些研究成果并没有直接探究中国作出核决策的原因,而是通过深入挖掘史料和档案来论述20世纪50年代初期相关国家的对华核政策,从而间接地映射出中国之所以研制原子弹的外部因素。^③

(二) 关于苏联对华核援助及其撤援。近年来,随着大量档案资料的解密和相关史料类著述的不断出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历程中重要的历史关节点和重大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如中国如何争取到苏联核援助,中国原子能事业是如何从原子能和平利用过渡到原子弹研制,中国成功完成原子弹攻坚任务的关键所在等等。这其中,有关苏联对华核援助及其撤援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苏联向国外派遣顾问和专家的动机问题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有学者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赫鲁晓夫必须保持与各国共产党的密切联系并取得他们的支持,才能使莫斯科保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地位。同时,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因其在朝鲜战争中的卓越贡献而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新生力量。综合以上两种情况,赫鲁晓夫作出了向中国提供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以求得中国领导人理解和支持的选择。由此可见,苏联援华很大程度是出于其主要领导人的主观意志。至于苏联为什么突然毁约停援,学者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有学者主要强调1958年中国军队炮击金门事件,认为这一事件使中苏两党在“战争与和平”、“核武器”等认识上的分歧进一步固化和扩大,而上述分歧和不信任直接影响了苏联对中国核武器及相关技术援助的力度和速度;^④ 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除炮击金门事件外,同时期发生的“联合舰队问题”、“导弹风波”事件也是促使苏联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核技术的重要因素;有学者从苏联外交政策出发,指出苏联的外交政策主要依据苏联对核武器作用的认识以及苏联军事战略的调整,从这一角度分析,中苏两国在核武器和核战争态度问题上的分歧是导致苏联撤援的又一原因;^[11] 还有学者指出,赫鲁晓夫的个人因素与苏联停止对华核援助有很大的关系,这一原因与苏联决定向中国施以原子弹研制方面的援助的原因是相一致的,一旦苏联领导人察觉到中苏关系出现一点令人不安的迹象,莫斯科首先关闭的就是核援助的大门。^[12]

(三) 关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研制的经验。回顾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历程,总结其中所凝聚着的丰富经验,并从中引出一些规律性认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大规模系统工程的经验,对于当今国家战略发展、国家安全建设、武器和科学技术发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多数研究成果都是从某一方面着眼来论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①陈能宽. 中国为什么下决心搞原子弹 [J]. 神剑, 2005(2); 刘国新. 简论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 [J]. 国际政治研究, 2009(4)。

^②沈志华. 援助与限制: 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1949-1960) [J]. 历史研究, 2004(3); 孙丽. 苏联对中国核技术援助探析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9(5); 阎俊丽. 我国五十至七十年代核战略的美苏因素及现实思考 [J]. 理论导刊, 2008(8)。

^③赵学功. 核武器与美国对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政策 [J]. 美国研究, 2004(2); 赵学功. 核武器与美国对朝鲜战争的政策 [J]. 历史研究, 2006(6); 郭学堂. 美国对华核威慑政策和中国的反应——50年代两次台海危机的历史考察 [C] // 美国问题研究.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周桂银. 冷战时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特征与启示 [J]. 中国当代史研究, 2002(6)。

^④刘建萍. 苏联对1958年中国炮击金门的政策反应及其影响 [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0(4); 沈志华. 炮击金门: 苏联的应对与中苏分歧 [J]. 历史教学问题, 2010(1)。

研制的经验。例如,刘红林、王廷育主编的《在核基地的岁月里: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亲历》^[13]以丰富的图片资料和详实的文字,记录了在极其困难的工作条件和恶劣的气候环境下,“原子城人”在6年多的时间里,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终于将原子弹研制成功这一光辉的历程;刘戟锋等著《两弹一星工程与大科学》^[14]以大科学为视角,从管理和技术两个层面深入分析了“两弹一星”工程成功的原因,特别是技术层面的分析,突破了多数学术性论文只注意于管理层面的统一领导、大力协同等因素,充分肯定了研制历程中所体现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精神;黄松平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原子弹工程人才结构研究》^[15]从人才结构这一独特视角探索中国原子弹研制成功的原因,并得出一支素质好、训练有方的人才队伍和组织结构和谐、工作协调的群体是保证大科学计划顺利实施的重要条件的结论。也有进行综合性总结的。有学者归纳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奋斗中,创造了建立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科学决策选准攻关方向、多方面培养科技人才、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形成并有效组织“大科研”、实施不间断的具有高度权威的领导等一系列宝贵经验。^[16]《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将中国核工业建设经验总结为七条:卓有远见的战略决策、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高度集中领导和全国大力协同、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科学管理、一支坚强的核专业队伍、坚持质量第一和安全第一。以上经验同样适用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据笔者所搜集的资料来看,这是目前为止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经验最为全面的概括。

(四)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研制的意义。世界爱好和平、对我友好的国家和人民这样总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研制的意义:“人民中国突破了核垄断俱乐部的大墙,在整个地球上引起了一场真正的革命。”“中国有了原子弹,使亚洲和世界和平能得到更有利的保障。”^{[8]57}但遗憾的是,目前,尚未有学者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的重要意义进行专门的、系统的论述,相关内容只能零星见诸于部分论著。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内穷外困的基础上迅速研制出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武器,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地位,对当时可能一触即发的世界局势起到了重要的维稳作用。^[17]有学者则认为,中国原子弹的成功研制除实现了对国家安全的诉求外,还实现了对民族复兴、外交独立、国际认可和尊重、追赶先进、实现现代化的多种诉求,其所体现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18]还有学者指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中国在国防科技事业的奋斗中,培育了广大科研工作者“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攻坚国防尖端技术的精神。^[19]

此外,一些纪实性著作、文章以及电视纪录片也值得关注。^①这类纪实性的成果多注重对历史事实的描写,内容详实,语言生动,其所提供的诸多历史细节信息,为我们全面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因其多来源于作者对当事人的采访,再加之偏重文学性描述,甚至或多或少带有些许传奇色彩,其内容缺乏完全的权威性与可信度。

三、加强和深化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研究的思考

综上所述,有关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存在可深化研究的课题和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概括地说,学界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研究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①东生. 天地颂[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0; 孟戈非. 未被揭开的谜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梁东元. 原子弹调查[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5; 梁东元. 东方巨响——中国核武器试验纪实[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5; 梁东元. 中国飞天大传[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 梁东元. 596 秘史[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 贾俊明. 倚天——共和国导弹核武器发展纪实[M].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09。

其一,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不够完整。从整段历史的梳理来看,原子弹研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专业性和复杂性必然会影响现有研究的完整性。当然,对这段将近16年的历史中的所有细节都有所关照是很难做到的。如何在把握整个历史脉络又不失体现这项工程复杂性和专业性特点的前提下,将丰富多彩的历史片段融合成为全面系统的历史记述,同时,还要做到详略得当,是当前研究正在努力突破的难题。从国际影响力来看,现有研究成果多属纪实性,就原子弹谈原子弹的成分较多,忽略了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客观分析,没有将中国原子弹研制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综合考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更多地可以解读为政治事件。任何政治事件的发生,必然与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事实上,正是20世纪40年代、50年代的国际形势催生了中国的核决策,而中国的核决策以及整个原子弹的研制历程也大大改变了当时的国际战略格局。

其二,关于重要历史关节点的研究过于僵化。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历程中几个大的关节点的研究,为我们从整体上评估这段历史提供了正确的方向。然而,遗憾的是,近年来,学界关于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却愈益僵化。一方面,现有研究在追逐热点问题的同时,忽视了思考的独立性,在主要观点提炼、基本史料运用方面存在严重的重复现象,致使对关键问题的认识不够全面。例如,关于中国的核决策,到底主要是中国自主决策还是多数研究所认为的当时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以及苏联援助等客观因素推动的结果?多数学者将中国核决策的动因归结为美国对华核威胁,但实际上,综合来讲,中国的核决策体现了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既是中国的自主决策,也离不开外部因素的推动,既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也是中国国家建设与发展长远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关于原子弹研制历程中重要关节点的重复分析致使其它的一些重要细节问题成为研究盲点。例如,对苏联核援助的分析,研究点多为苏联援助的内容,具体论述苏联在核科学、核技术以及核人才的等方面的援助,至于中国是如何争取到苏联的核援助的、苏联援助的重心如何从一开始的原子能和平利用转向后来的原子弹研制的、中苏关于核武器研制的协定是如何签订的、苏联撤援对中国原子弹研制究竟产生了哪些不利影响等问题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分析以上研究缺憾,笔者认为,可以从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两个方面来归纳原因。

从客观条件分析,原子弹研制本身所有的性质制约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展开。一是原子弹研制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依仗其手中的核武器,屡次威胁中国。为粉碎超级大国的核威胁,中国只能“以核制核”,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一旦中国开始发展原子能事业,超级大国必然要进行百般阻挠,故这一关乎国家战略发展的重大事业必须在极高的保密状态下进行。这就造成了许多重要会议无会议纪要,重大决定无明文下发,重要事件无媒体记载,再加上留存的档案至今尚未解密,有关中国原子弹研制历程的研究因研究条件不足而尚未充分展开。二是原子弹研制的政治性。发展原子能事业,是中国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因此,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并不是一件单纯的军事科研事件,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属性。从这一角度讲,只有做到以宏观战略视野来探析微观细节,才能奉献出一部能够展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全貌的精品力作。精准把握当时的国际安全形势,认清当时的国家安全需要,并把对原子弹研制历程的考察放到这一视阈中是学界尚未攻克的一个难题。三是原子弹研制的专业性。铀矿开采、铀的提取与精制、爆轰物理实验等都是原子弹研制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但因其涉及较多物理、化学、地质等理工科专业知识,多数论者往往对此一带而过,甚至避而不谈,致使相关研究不够完整。四是原子弹研制的复杂性。原子弹研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理论、设计、试验、生产等诸多环节,需要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国防科委、冶金部、地质部、兵器部、卫生部等多个部门大力协同才能得以完成。这无疑会使得相关研究要么从全局出发却未做到详略得当,忽视了对重要细节的详细考察,要么从局部着眼却未凸显研制历程的系统性与复杂性,缺乏对历史事件的全局把握。

从主观认知的角度来看,对一些核心概念混淆,往往是致使一些重要关节点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以原子能和原子弹的概念为例。原子能,又称核能,它是指原子核中的核子重新分配时释放出来的能量,而原子弹,也称裂变弹,类属核武器,它是利用重元素原子核链式裂变反应释放核能形成

爆炸的一种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从物质属性来看,原子能和原子弹全然不同。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和研制原子弹也多被混淆为一个事件。事实上,两者虽有重合,但性质完全不同。一般认为,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标志着中国的原子能事业的正式起航。1957年底,出于自卫和保卫世界和平的目的,以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签订为标志,中国开始着手研制原子弹。这时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布局的重心才从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转向原子弹研制。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是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的一个阶段,中国正式开始研制原子弹的时间事实上是晚于中国开启原子能事业的时间的。此外,“原子能最主要的应用,毫无疑问,将是解决人类即将遭遇的燃料问题。”^[20]中国的原子能事业,虽然一开始的方针是首先用于军事目的,但却起步于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并将以此作为最终目标。作为核武器的一种,中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直接目的必然是军事用途,但中国政府始终强调,“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21] 280-281}这足以说明,中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政治目的大于军事目的。可见,如果混淆了原子能和原子弹的概念,就会忽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重要意义,事实上,这是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是特别值得关注和研究的。

我们可以在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历史进程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对主观认识方面的误区进行校正,但客观条件的限制却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现有资料中挖掘有效信息、如何另辟蹊径找到认识历史的新视角等等,都需要研究者认真加以思考。总之,因事件本身的特质等原因,进一步推进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研究存在很多困难,相关研究者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 Alice Langley Hsieh. Communist China's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era [M].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2.
- [3] Alice Langley Hsieh. Communist China's secret military paper [J].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 (Apr. -Jun. 1964).
- [4] John Wilson Lewis & Xue Litai. China builds the bomb [M].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5] L. Partahi & Alexander. The fifth nuclear power [J]. Nature, Vol. 336, No. 6199, (Dec. 1988).
- [6] Gordon Chang. JFK, China, and the bomb [J].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4, No. 4 (Mar. 1988).
- [7] William Burr & Jeffrey T. Richelson. Whether to 'Strangle the Baby in the Crad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Nuclear Program, 1960-1964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Winter 2000).
- [8] 李觉.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 [9] 王洪鹏. 20世纪40年代原子弹爆炸在中国产生的震荡 [D].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 2007.
- [10] 李俊亭. 使中国挺直腰板的战略性抉择 [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5(2).
- [11] 戴超武. 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 (下) [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1(5).
- [12] 沈志华. 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9.
- [13] 刘红林. 在核基地的岁月里: 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亲历 [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1.
- [14] 刘戟锋. 两弹一星工程与大科学 [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5.
- [15] 黄松平. 中国原子弹工程人才结构研究 [D].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06.
- [16] 杨贵华. 中共中央发展国防科技工业的决策与领导 [J]. 中共党史研究, 2003(1).
- [17] 李峻. 建国后毛泽东国防发展战略思想简论 [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4(2).
- [18] 张静. 核武器与新中国60年发展历程 [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9(5).
- [19] 杨贵华. 中共中央发展国防科技工业的决策与领导 [J]. 中共党史研究, 2003(1).
- [20] 杨澄中. 介绍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科学技术展览会 [J]. 物理通报, 1956(8).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19册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 尹正达)